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编委会

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

第一辑

科学出版社

83

5

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编委会 编

科学出版社

1994

(京)新登字 092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入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论文 27 篇。这些论文大多属于作者承担的考古学研究课题成果,他们以自己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分别对汉唐时期的重要城市,中国古代的陶瓷、金银、玉器手工业,建筑考古学,边疆地区考古和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等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学术观点。

本书对从事考古、文物、历史、自然科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工作的人员和研究者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吴铁双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94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199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 插页:4

印数:1—1100 字数:443,000

ISBN 7-03-004161-5/K·47

定价: 22.00 元

前 言

为了促进我所汉唐考古与边疆考古科研工作的开展,及时反映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并为中青年研究人员创造一个及时发表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的园地,以便多出成果,早出人才,我们特编辑出版了《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

本书是该学术论文集第一辑。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秦汉至元明时代的历史时期考古;二是我国边疆地区考古。这部论文集就是反映上述有关学术研究领域的科研成果。就秦汉至元明时代的历史时期考古而言,汉唐时代考古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因此本论文集名之为《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

在本辑的编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所领导和所内外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关怀。我所的王仲殊、卢兆荫、杨鸿勋、杨泓、叶小燕、孟凡人等以及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宿白先生审阅了本书的部分文稿。杨焕新同志协助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科学出版社也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编辑委员会由刘庆柱、孟凡人、段鹏琦、孙秉根同志组成。孙秉根同志任本辑执行编委。由于本书的内容较广,编写的时间紧促,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疏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编委会

1994年5月

目 录

前言

战国秦汉瓦当研究·····	刘庆柱	1
汉长安城的发掘与研究·····	李遇春	31
汉长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几个问题·····	孟凡人	48
汉代诸侯王、列侯墓的地面建制		
——汉代王、侯墓制研究之一·····	刘振东	67
汉代陶窑初论·····	李毓芳	76
关于南越王墓玉器的几个问题·····	古 方	92
试论北魏洛阳城的形制与中亚古城形制的关系		
——兼谈丝路沿线城市的重要性·····	孟凡人	97
炳灵寺 169 窟塑像与壁画题材考释·····	常 青	111
“千秋万岁”图像源流浅识·····	朱岩石	131
南北朝胡叟舞蹈俑考·····	赵永红	136
略谈隋唐东都宫城、皇城和东城的几个问题·····	杨焕新	144
试谈唐东都洛阳宫的几座主要殿址·····	杨焕新	152
唐代扬州河道与二十四桥考·····	蒋忠义	162
试谈丝绸之路上的扬州唐城·····	俞永炳	169
读唐崔凝及其妻李氏墓志·····	段鹏琦	173
略谈唐代金银器研究中的分期问题·····	赵 超	178
大同旧城的形制布局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丁晓雷	184
渤海墓葬的类型与分期·····	孙秉根	188
隋唐宋时期洛阳园林考古学初探·····	王 岩	225
从考古资料看中国唐宋时期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	马文宽	231
南宋官窑与龙泉窑的关系·····	李德金	250
唐代黑陶钵考·····	安家瑶	259
铁蒺藜、蒺藜火球、瓷蒺藜·····	张连喜	264
关于建筑考古学·····	杨鸿勋	268
论红山文化建筑与手工业技术进步·····	刘国祥	272
新疆和静察吾乎沟四号墓地带流罐试析·····	丛德新	285
西安、北京建都与商周以前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朱延平	289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ON THE HAN-TANG
PERIOD AND BORDER AREAS OF ANCIENT CHINA (I)

Contents

Preface

Liu Qingzhu, A study into Tile-ends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Periods	(1)
Li Yuchun, Excavations and Studies of Han Chang'an City	(31)
Meng Fanren,	
Some Problems on the Plan and Layout of Han Chang'an City	(48)
Liu Zhendong, Surface Building Pattern of Princes' and Marquises' Tombs in the Han Period: Studies into the Pattern of Princes' and Marquises' Tombs in the Han Period (I)	(67)
Li Yufa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Han Pottery-making Kilns	(76)
Gu Fang, Some Problems on the Jades from the Nanyue King's Tomb	(92)
Meng Fanre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an of Northern Wei Luoyang City and That of Ancient Central Asian Cities: Also on the Importance of Cities along the Silk Road	(97)
Chang Qing, A Study in to the Subjects of the Sculptures and Murals in Cave 169 of the Bingling-si Temple	(111)
Zhu Yanshi, On the Origin of the Figure "Long Liv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131)
Zhao Yonghong, On the Funeral Figurines of Old Men-dancers in Northern Tribes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136)
Yang Huanxin, Some Problems on the Palace City, Imperial City and Eastern City of the Sui and Tang Eastern Capital	(144)
Yang Huanxin, On the Main Hall-foundations of the Luoyang-gong Palace in the Tang Eastern Capital	(152)
Jiang Zhongyi, A Study of River Courses and the Twenty-four Bridges in Tang Yangzhou	(162)
Yu Yongbing, On Tang Yangzhou as a City on the Silk Road	(169)
Duan Pengqi, On the Epitaphs of Cui Ning and His Wife Li, Tang Period ...	(173)
Zhao Chao, Briefly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Goldware and Silverware of the Tang Period	(178)
Ding Xiaolei, Plan and Layout of the Old Datong City and the Features of Its Time They Reflect	(184)
Sun Binggen, Typology and Periodization of Bohai Tombs	(188)
Wang Yan, A Preliminary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Gandens in Luoyang City of the Sui, Tang and Song Periods	(225)
Ma Wenkuan, O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ang-Song China and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ical Data	(231)
Li Dej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thern Song Guan Yao and the Long-	

quan Yao.....	(250)
An Jiayao, On the Black Pottery Bowl of the Tang Period.....	(259)
Zhang Lianxi, The Iron Caltrop, Caltrop-mine and Ceramic Caltrop	(264)
Yang Hongxun, On Architectural Archaeology.....	(268)
Liu Guoxiang, On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in Architecture and Handicrafts	(272)
Cong Dexin, On the Spouted Jars from Cemetery IV at the Chawuhu Pass, Hejing, Xinjiang	(285)
Zhu Yanping, Relationship of the Founding of Xi'an and Beijing as Capitals to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Before the Shang-Zhou Period	(289)

战国秦汉瓦当研究

刘 庆 柱

一、引 言

瓦当是我国古建筑物上的一种建筑材料。它的出现,表明了建筑技术的进步。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至迟在西周时代,建筑物上已开始使用瓦当,战国时代瓦当的使用已相当广泛,秦汉时期的瓦当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工艺之精,称誉于后世。

瓦当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是从文字瓦当开始的。瓦当的研究始于北宋,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 1091 年)陕西宝鸡权氏得“羽阳千岁”文字瓦当,事载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黄伯思《东观余论》通过对瓦当文字的考据,拓宽了文字瓦当研究领域。南宋无名氏《续考古图》著录汉代瓦当四品(“益延寿”、“官立石苑”、“长乐未央”、“羽阳千岁”文字瓦当),仅摹图形。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分别摹拓了“长乐未央”、“长生无极”、“汉并天下”、“储胥未央”、“万寿无疆”、“永奉无疆”、“羽阳千岁”、“上林”、“楚”文字瓦当,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清代关于瓦当方面的著述颇丰,主要有林佺《汉甘泉宫瓦记》一卷、朱枫《秦汉瓦当图记》四卷、程敦《秦汉瓦当文字》二卷续一卷,陈广宁《汉宫瓦当》一卷、钱站《汉瓦图录》四卷、申兆定《涵真阁秦汉瓦当图说》(未有传本,见于《金石萃编》征引)、毕沅《秦汉瓦当图》和《关中金石记》、吴大澂《愬斋砖瓦录》、王福田《竹里瓦当文字》、黄中慧《琴归室瓦当文钞》、何遂《绘园藏氏》、王仙洲《古瓦绘图》、钱亦轩《半官瓦当文考》、吴隐《涿斋秦汉瓦当存》、高鸿裁《上陶室砖瓦文攷》十册、端方《陶斋藏瓦录》、王襄《簠室古簠》、陈介琪《陶斋藏古目》、张廷济《清仪阁古器物文》、王昶《金石粹编》、冯云鹏、冯云鹗《金石索》、翁方纲《两汉金石记》、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陈抱之《求古精舍金石图》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朱枫、程敦编著的二书。前者载入瓦当 30 品,异文十六七种;后者收录瓦当 139 品,异文达 55 种。民国时期的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五卷,收录瓦当 309 品,对清代以来学者的瓦当研究作了总结。

国外学者对我国古代瓦当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日文版《汉瓦当文集》(1960 年)、下中弥三郎《书道全集》(平凡社,1931 年)、堀口苏三《秦汉瓦砖集录》和关野雄《半瓦当之研究》。

近年由于战国秦汉时代建筑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出土了大量瓦当。战国秦汉瓦当的辑录与研究,较前大大发展了。此间的重要著作有陈直《关中秦汉陶录》(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室藏)、陕西省博物馆编著《秦汉瓦当》(文物出版社,1964 年)、钱君匋等《瓦当汇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华非《中国古代瓦当》(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年)、徐锡台等《周秦汉瓦当》(文物出版社,1988 年)、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秦汉瓦当》(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86 年)、河南省博物馆编《秦汉瓦当》(《中原文物》1987 年特刊)、李

发林《齐故城瓦当》(文物出版社,1990年)、杨力民《中国古代瓦当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刘士莪《西北大学藏瓦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其中尤以《新编秦汉瓦当图录》和《周秦汉瓦当》,因其所收录的瓦当中有不少考古调查和发掘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然而,虽然已有上述的众多发现与研究,但是当前关于战国秦汉瓦当的研究还仅是起步阶段,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二、发现与分布

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瓦当是西周中期的陕西扶风召陈宫殿建筑遗址和岐山礼村西周遗址中出土的瓦当^①,此外在春秋时代的洛阳东周王城、凤翔秦雍城、临淄齐故城、江陵楚纪南城等遗址均出土了一些春秋时代的瓦当。战国、秦汉时代,各地大兴土木,遗留下的瓦当数量甚为可观。这一时期的瓦当,就数量和品种而言都要首推陕西关中地区。此外,在河南洛阳,山东临淄、曲阜,河北邯郸、易县、石家庄、秦皇岛,以及在湖北、安徽、辽宁、内蒙古、福建、广东等地的战国、秦汉建筑遗址也都出土了不少瓦当。

陕西地区

陕西凤翔^②、西安阎良武屯镇^③、咸阳市窑店镇^④曾先后是战国时代秦国都城所在地。这里的战国时代建筑遗址中出土了数量颇多瓦当。此外,在西安洪庆堡秦芷阳城遗址和临潼秦东陵陵区建筑遗址中也出土了战国时代瓦当^⑤。而渭河南岸的阿房宫遗址和临潼秦始皇陵区的秦代建筑遗址所出土的瓦当^⑥,可谓秦代瓦当的标型。

西安西北郊是西汉王朝京都长安城所在地。三十多年来,汉长安城遗址,曾先后发掘了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和直城门遗址^⑦,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⑧、武库遗址^⑨和未央宫遗址等^⑩。这里出土的西汉瓦当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均居全国各地汉代遗址之首。

西安附近的西汉王朝诸帝、后陵园建筑遗址出土的瓦当为数不少,其中尤以汉太上皇陵^⑪、高祖长陵^⑫、武帝茂陵^⑬、宣帝杜陵^⑭、钩弋夫人云陵陵区建筑遗址出土的汉代瓦当较多^⑮。这为建立西汉瓦当的年代序列,提供了一批珍贵的标本。

关中地区分布有许多秦汉时代离宫与其它重要建筑遗址,这里出土的大量瓦当极大地丰富了秦汉瓦当内容。其中尤以淳化县境内的甘泉宫遗址出土的秦汉瓦当数量最多^⑯。此外,蓝田焦岱镇鼎胡宫遗址^⑰、韩城芝川镇扶荔宫遗址和凤翔附近的汉代官观遗址中也出土了不少汉代瓦当^⑱。80年代初发掘的西汉京师仓遗址,出土了一大批西汉中、晚期瓦当^⑲。

河南地区

洛阳是东周都城所在地,西汉时代的重要城市——河南县城亦置于此。东汉时代,洛阳取代长安成为了汉王朝京都。近年来,这里对战国两汉遗址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勘察发掘,出土了不少瓦当^⑳。河南郑州^㉑、南阳^㉒等地的汉代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些汉代瓦当。

山东地区

临淄曾是春秋和战国时代的齐国都城所在地,当时相当繁华。西汉时代的临淄,作为

高祖长子刘肥及其子孙的封地,“富比京华、宫观林立”,建筑考究。60—7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对临淄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和发掘^②。这里发现的战国秦汉瓦当之多,仅次于西安和洛阳^③。

本世纪40年代,在曲阜发掘了鲁城灵光殿遗址^④。70年代后半期,考古工作者又对鲁城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勘察和重点试掘^⑤。这里是山东地区出土汉代瓦当较多的又一地方。

河北地区

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都城故址分别位于易县和邯郸。二地均曾进行过多次考古勘察和发掘,出土了不少战国及秦汉瓦当^⑥。冀中的平山三汲古城和石家庄附近的藁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获得了一些战国秦汉瓦当^⑦。近年在秦皇岛市北戴河发掘的秦汉行宫遗址出土的瓦当具有重要意义^⑧。

其它地区

山西的夏县^⑨、万荣^⑩和洪洞^⑪等地的战国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开展了部分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一些瓦当。

辽宁绥中秦始皇行宫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北方地区秦代瓦当资料^⑫。此外,在宁城^⑬、三道壕^⑭、锦州^⑮、建平^⑯、丹东^⑰、大连等地也都出土了汉代瓦当^⑱。内蒙古包头^⑲、呼和浩特等地^⑳,青海西宁^㉑,江西都昌^㉒等地区的汉代遗址和墓葬中,也有汉代瓦当出土。

随着对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对江汉平原上的湖北江陵楚纪南城和安徽寿县寿春故城及其楚国故地城址等进行了考古勘察和发掘,也采集、发掘出土了一些瓦当。总的来说,其品种较为单调^㉓。

在我国南方地区,福建和广东地区秦汉遗址考古发掘,开展工作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福建崇安汉城出土了700余件汉代瓦当^㉔。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㉕、五华县和澄海县南越行宫遗址^㉖,都出土了一批汉代瓦当。福建、广东的汉代瓦当,地方特点比较接近,这反映出闽越和南越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但其瓦当的主体文化因素还是与中原地区一致的。

三、分类与分期

战国秦汉瓦当依据其形状,一般可分为半圆瓦当(或者称半瓦当)和圆瓦当两种,此外还有数量较少的大半圆瓦当和弯月形瓦当。

半圆瓦当是瓦当出现的最初形式。目前可以确知时代最早的瓦当即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召陈村西周中期建筑遗址内的半圆瓦当^㉗。除楚国故地之外,其它各地半圆瓦当的使用和流行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要早于当地的圆瓦当。在陕西关中地区,春秋时代仍然仅流行半圆瓦当,进入战国时代半圆瓦当已退居次要地位。河南洛阳地区半圆瓦当的出现约在东周初期^㉘,战国时代和秦代主要流行半圆瓦当,到西汉时期半圆瓦当仍相当流行,进入东汉时代,半圆瓦当则已绝迹。齐临淄的半圆瓦当出现可早至春秋时代,战国、秦和西汉时代一直是当时主要流行的瓦当,其绝迹约在东汉时代^㉙。曲阜鲁城的半圆瓦当远不如

齐临淄发达，这里的西汉时代地层中已很少见到半圆瓦当了^⑤。河北易县燕下都是战国中晚期燕国都城，半圆瓦当十分流行^⑥。始建于战国中期的邯郸赵王城，半圆瓦当为数甚少^⑦。介于燕赵二都城之间的中山国都城——平山三汲古城，出土了不少半圆瓦当^⑧。此外，在郑韩故城^⑨、河南登封古城^⑩和楚纪南城、当阳季家湖楚城等战国城址中均出土了半圆瓦当^⑪。需要指出的是，楚国故地的战国时代中期以前的建筑遗址出土的半圆瓦当数量和种类都较少。

就制作工艺考察，半圆瓦当应从圆瓦当发展而来，这从有些圆瓦当当面之上的纹饰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如齐临淄城遗址出土的瓦当中，有些圆瓦当当面之上置有两组半圆形图案，对称分布，内容雷同。将其切割一分为二，即成两个大小相同、图案一样的半圆瓦当。也有极个别半圆瓦当当面树枝仅余左边四条，右边枝条不见。下方一枝卷成云纹，树干空间填一朵云纹。左下另一朵云纹应是另一件半圆瓦当上的图案。上述情况显然是切割偏了的半圆瓦当。它更加证实了半圆瓦当是由圆瓦当切割而成^⑫。类似上述情况，在关中地区发现的秦瓦当中也有存在

圆瓦当普遍出现于战国时代，个别地区可能会早至春秋时代。在战国时代的秦、赵之地圆瓦当甚为流行，而洛阳地区圆瓦当的流行约在西汉时代，但洛阳地区的不少西汉时代建筑遗址中半圆瓦当仍然要多于圆瓦当^⑬。比较来看，燕国的圆瓦当甚少。齐国的圆瓦当由战国至秦汉也不甚发达。

大半圆瓦当流行于秦代，多用于皇室大型宫殿或礼制建筑。此类瓦当，大多数当面饰夔纹，面径52—61厘米；个别也有饰卷云纹者，面径43厘米。在西安藿高村的阿房宫遗址，临潼的秦始皇陵园遗址，河北省秦皇岛金山咀、横山和辽宁绥中石碑地的秦始皇行宫遗址，均发现了大半圆瓦当，但每处出土这种瓦当数量甚少。它们可能用于屋脊之上，不同于一般瓦当的使用方法。由于这类瓦当个体巨大，它们又有“瓦当王”之美称。

弯月形瓦当仅见于西安的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中^⑭。

根据瓦当当面纹饰，战国秦汉瓦当又可分为三大类，即：素面、图象和图案及文字瓦当。

素面瓦当出现时代最早。一般来说，素面瓦当主要是素面半圆瓦当，其数量不多。陕西扶风召陈村周原遗址出土的西周中期的半圆瓦当以素面占多；饰有图案或图象的半圆瓦当大都晚出^⑮。关中地区的素面半圆瓦当历经春秋、战国和秦代^⑯，一直延用到西汉时代，在汉长安城遗址和高祖长陵陵区遗址的西汉文化层中均有发现^⑰。

洛阳地区的素面半圆瓦当约出现在东周初期，它们是否受到陕西周原西周中期素面半圆瓦当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但不能排除其可能。这里的素面半圆瓦当延用至西汉初期^⑱。齐国临淄故城遗址出土的这类瓦当可早至春秋时代^⑲。河南登封战国城址出土了战国早期的素面半圆瓦当^⑳。战国中期的河北平山三汲古城遗址常见的瓦当亦为素面半圆瓦当^㉑。此外，战国时代的邯郸城^㉒，曲阜鲁国故城^㉓，楚都纪南城^㉔、湖北当阳季家湖楚城^㉕，安徽寿县的楚郢都寿春城^㉖、郑韩故城等遗址^㉗也都出土有素面半圆瓦当。素面半圆瓦当的使用时间很长，几乎与半圆瓦当的存在相始终。不过随着图案和图象及文字瓦当的出现，素面半圆瓦当在半圆瓦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少，而至东汉时代已不见。

素面圆瓦当是目前已知各类圆瓦当中出现时间最早的。从现有考古发掘材料来看，

最早的素面圆瓦当以楚国故地出土最多,使用亦较广泛。如建于春秋中晚期、战国废弃的楚国章华台遗址,纪南城松柏鱼池遗址和纪南城1号窑址(Y₁)均有出土,战国时代的宜城楚皇城、当阳季家湖楚城、纪南城古井遗址^⑭,楚郢都寿春城遗址^⑮和邯郸故城^⑯、登封战国城址也有少量出土^⑰。在西汉时代的建筑遗址中素面圆瓦当还有发现,甚至在极个别建筑物上还大量使用,如建于西汉晚期的长安明堂建筑遗址发现的瓦当绝大多数为这类瓦当(计38品),仅有一品云纹瓦当^⑱。

图象和图案瓦当是战国秦汉瓦当中的大宗,其纹饰纷繁,早期种类较多,地区性特点较明显。秦统一后,瓦当纹饰的地区性特点渐少,统一性的纹饰特点占主导地位。为了便于对战国秦汉时期各地图案、图象瓦当的研究,下面将其分成几个大的区域进行探索。

关中地区

这里是周、秦和汉王朝的京畿之地,是瓦当出现最早的地方。其瓦当的发展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其它地区。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最早出现的瓦当当面纹饰是半圆瓦当上的仿铜纹饰的重环纹,它们约流行于西周中晚期。这类半圆瓦当个体大于素面半圆瓦当。重环纹半圆瓦当有大小两种:大者径25.5厘米,边轮内饰一周重环纹,中心又横饰重环纹;小者径17.7厘米,边轮内饰三周弦纹,再饰重环纹,中心为同心圆纹^⑲。上述瓦当出土于陕西扶风召陈村的周原遗址之中。

由于铜器纹饰的繁复纤细,置于房顶的瓦当当面饰以仿铜器花纹效果不佳,于是在关中地区春秋时代的秦瓦当上出现了一种以绳纹构成的仿玉器的“璜”纹。这种“璜”纹又分成单璜纹和双璜纹,后者在当面之上为大、小二半圆形成的璜纹。如陕西凤翔豆腐村、铁沟村和马家庄等地的春秋时代秦遗址中就出土了不少这类瓦当^⑳。璜纹的使用,大概是一因玉器的高贵,二因其线条的简洁。

关中地区发现的战国时代半圆瓦当数量很少,仅有树木双兽纹、山云纹和变形夔纹半圆瓦当。它们并非是从关中地区春秋时代的璜纹半圆瓦当发展而来,而可能是受到了齐临淄树木双兽纹和燕下都山云纹半圆瓦当的影响。变形夔纹半圆瓦当则有可能是洛阳变形夔纹半圆瓦当的变种,或者也许受到了商周铜器花纹的某些影响。战国时代,关中地区的圆瓦当已取代了半圆瓦当,成为了瓦当中的主流。

动物纹圆瓦当首先在战国秦遗址中发现,陕西凤翔出土的麋鹿纹、子母鹿纹圆瓦当,颇具时代和地方特色。此外,单体动物纹圆瓦当还有獾纹、夔凤纹、蟾蜍纹等。复合动物纹圆瓦当当面纹饰有双獾纹、猎人斗兽纹、奔兽逐雁纹、鹿鱼纹、鹿雁蛇树纹、鹿犬雁蟾蜍纹、鹿犬雁鱼纹等。上述瓦当均无界格,其时代约当战国前期和中期(见图1)。

战国中晚期的秦咸阳城和芷阳城遗址出土的动物纹圆瓦当,单体动物纹很少见到,绝大多数为复合动物纹,在同一当面出现多个或多种动物。与凤翔战国秦的复合动物纹瓦当不同的是,其当面已出现四区界格,它开启了秦汉瓦当当面四分区格局的先河。这时当面的动物纹饰仍为鹿、马、鸟、雁、鱼、龟等;但鹿纹所占比例大大下降,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动物纹饰,如蜻蜓纹饰等(见图2)。

不难看出,就动物纹圆瓦当的纹饰而言,其变化是从单体动物发展为复合动物。当面格局从无界格到出现扇形面四区间。一般而言,单体动物纹圆瓦当,当面均无界格,这类瓦当多出于战国秦雍城遗址,时代约在战国前期和中期。瓦当当面没有区间界格的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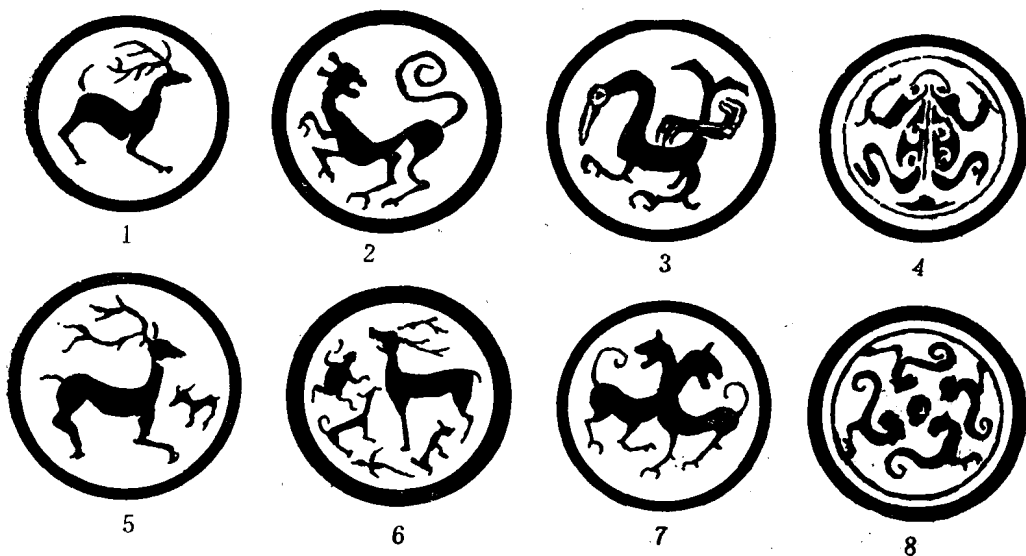


图1 无界格动物纹瓦当(《周秦汉瓦当》)

1.麋鹿纹瓦当(凤翔南古城秦遗址出土); 2.獬豸纹瓦当(凤翔铁沟村出土); 3.鸾凤纹瓦当(凤翔出土); 4.螭龙纹瓦当(凤翔豆腐村出土)(《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5.子母鹿纹瓦当(凤翔凤凰尾村出土); 6.鹿犬雁纹瓦当(凤翔铁沟村出土); 7.双獬豸纹瓦当(凤翔铁沟村出土); 8.四兽纹瓦当(凤翔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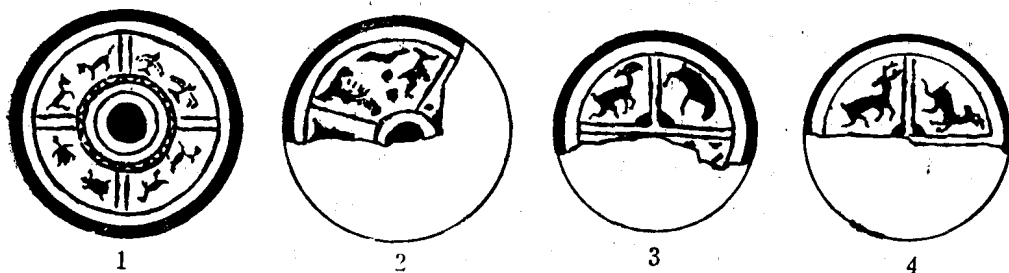


图2 四区格动物纹瓦当

1.咸阳一号宫遗址出土(《文物》, 1976年11期); 2.咸阳窑店出土(《周秦汉瓦当》); 3.临潼芷阳遗址出土(《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4.西安洪庆堡出土(《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动物纹瓦当,其时代似略晚于单体动物纹瓦当,可能流行于战国中期,这类瓦当亦大多出土于秦雍城遗址,咸阳、西安一带的秦遗址中仅有少量发现。当面以界格线分为四区间的复合动物纹瓦当,流行于战国中、晚期,在秦咸阳城、芷阳城遗址均曾出土。秦代这种瓦当可能已趋衰落,因此至今秦始皇陵区和河北、辽宁的秦始皇行宫遗址内尚未发现这种瓦当。

动物纹瓦当虽然至秦代已趋衰落,但其作为瓦当上的纹饰,延续时间很长。在秦汉甘泉宫故址出土的蟾蜍、玉兔和龟、蛇、雁纹圆瓦当,均系采集品,已脱离地层关系,其准确年代尚难断定。一般认为它们属于西汉时代瓦当^⑩。至于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出土的朱雀、青龙、白虎、玄武纹瓦当^⑪,作为礼制建筑的特殊需要,使用时间甚短。有人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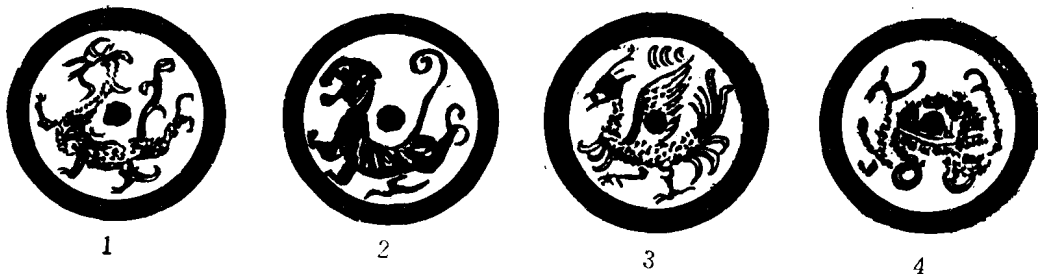


图3 四神纹瓦当(《周秦汉瓦当》)

1.龙纹圆形瓦当(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2.虎纹圆形瓦当(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3.朱雀纹圆形瓦当(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4.玄武纹圆形瓦当(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它们出现于西汉中期¹⁾,目前还缺乏力证。现在考古发掘出土的“四神”瓦当,均出土于汉长安城南郊西汉晚期的“宗庙”遗址²⁾。这种“四神”瓦当在汉哀帝义陵陵区也曾出土³⁾。陈直先生认为虽然“四神”瓦当多出王莽“九庙”,遗址,但此建筑系拆毁汉代上林苑和建章宫土木建筑材料所建,“瓦当应亦在移用之列”⁴⁾。笔者认为《汉书·王莽传》虽有建王莽九庙拆用建章宫及上林苑宫观材料的记载,但在这两处至今并未发现“四神”瓦当,因此很难说王莽九庙出土的“四神”瓦当是从上述两处建筑“移用”的。至于“四神”图案空心砖可能西汉中期已出现,但并非这种图案在瓦当上已必然使用。因为同一种纹饰,如“四神”纹饰,是否在砖和瓦当上同时使用现在还不清楚。根据目前已出土的考古资料,笔者认为“四神”瓦当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于其产生时间还有待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和进一步研究(图3)。

略晚于动物纹圆瓦当而出现的是植物纹圆瓦当。植物纹主要以花朵和四叶纹为主要内容,它们约出现于战国前期略晚,或战国中期稍早。在秦雍城、咸阳和芷阳等城址均有发现。作为主体纹饰的植物纹瓦当,在关中地区不甚发达,品种单一,主要为花朵纹。较早的瓦当当面花朵纹没有区间,战国中晚期芷阳城址出土的植物纹瓦当当面出现了四区界格布局,从多瓣形花朵发展为四支花蕾或四叶纹,这是战国晚期和秦汉时代瓦当当心四叶纹饰之先声。

约在战国时代初期,葵纹瓦当出现并很快流行起来,首先在秦雍城,尔后扩及栎阳、咸阳,一直延续使用到西汉初年。它是秦瓦当中最具地方和时代特点的瓦当之一。传统所说的“葵纹”实际并非源于植物的“葵花”⁵⁾,也不是“植物叶尖和动物尾部的结合体”⁶⁾。这种图案的来源,笔者认为是从传统所说的“辐射纹”(或称“轮辐纹”)、“旋云纹”发展而来。关于辐射纹、旋云纹及其演变出来的葵纹图案的含义可能是象征着运动的“水”。秦人以水纹装饰瓦当应与其主“水德”有密切关系⁷⁾。葵纹瓦当图案的基本定型在战国时代中期,战国时代晚期和秦代是其盛期,西汉初期仍在用,汉长安城中的一些西汉时代建筑遗址和汉太上皇陵园建筑遗址中均有出土。西汉中期葵纹瓦当已不再使用(图5)。

从葵纹纹饰变化来看,葵瓣从三线变为复线(即双线),进而发展成单线。葵瓣方向有

1) 徐锡台、楼宇栋、魏效祖:《周秦汉瓦当》云:“西汉圆形瓦当的重要纹饰依然是各类云纹,图案圆形瓦当,有以四神为题材的。在茂陵区内曾出土过四神图案的砖,由此可以断定四神圆瓦当应是西汉中期的产物。”

2) 咸阳市博物馆展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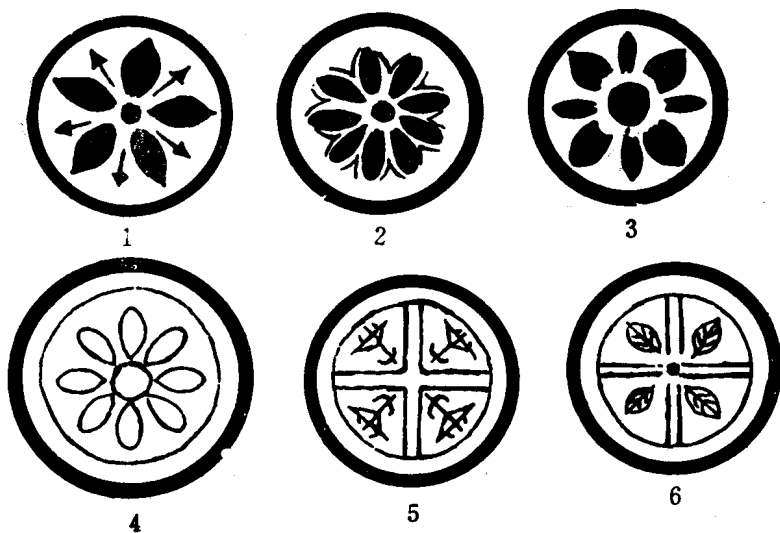


图4 植物纹瓦当

1.莲花纹瓦当(凤翔豆腐村遗址出土)(《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2.花朵纹瓦当(西北大学在陕西关中征集)(《西北大学藏瓦选集》); 3.莲花纹瓦当(西安市文管会在西安征集)(《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4.花瓣纹瓦当(咸阳窑店秦遗址出土)(《文物》, 1976年11期); 5.花苞纹瓦当(临潼芷阳遗址出土)(《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6.四叶纹瓦当(西安洪庆堡遗址出土)(《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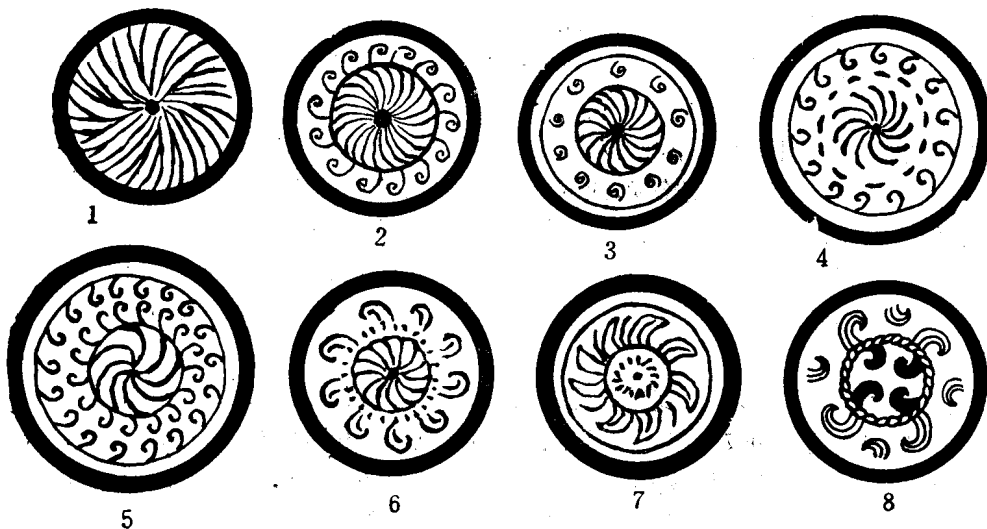


图5 葵纹瓦当

1.凤翔南古城秦遗址出土(《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2.凤翔孙家南头堡子壕遗址出土(《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3.凤翔铁沟村遗址出土(《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4.咸阳窑店秦遗址出土(《周秦汉瓦当》); 5.西北大学在陕西关中征集(《西北大学藏瓦选集》); 6.西安西郊阿房宫遗址出土(《西北大学藏瓦选集》); 7.西北大学在陕西关中征集(《西北大学藏瓦选集》); 8.凤翔南古城秦遗址出土(《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顺时针也有逆时针。葵纹中的葵瓣大小相间排列,一般各4个。大葵瓣尾部延至当面中央圆内又形成4个或3个小葵瓣。瓦当面外圆内的大小葵瓣,早期为同一方向,以后发展成大、小葵瓣反方向相间排列。当面被分成四区间,每区之内各有一大小葵瓣,背向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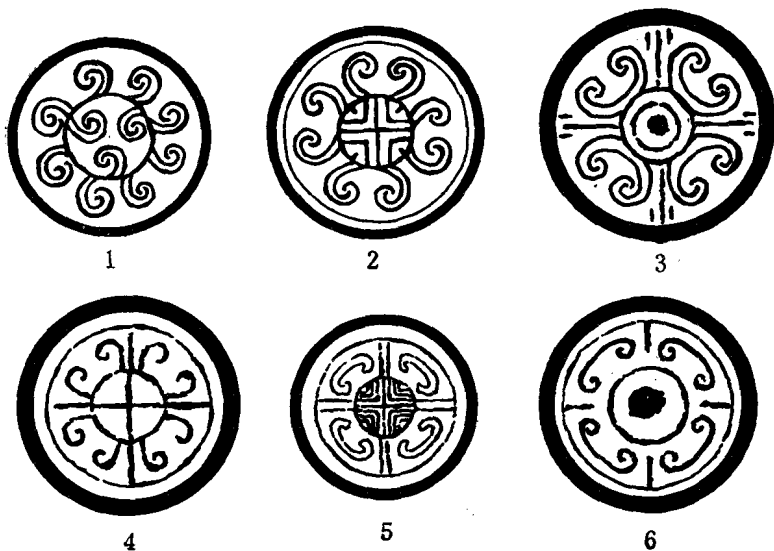


图6 葵纹、反云纹瓦当变化

1. 咸阳秦宫殿遗址出土(《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2. 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秦栎阳城址出土(《考古学报》, 1985年3期); 3. 咸阳长陵车站秦遗址出土(《周秦汉瓦当》); 4. 凤翔豆腐村秦遗址出土(《周秦汉瓦当》); 5. 咸阳一号宫遗址出土(《考古与文物》, 1982年2期); 6. 咸阳一号宫遗址出土(《考古与文物》, 1982年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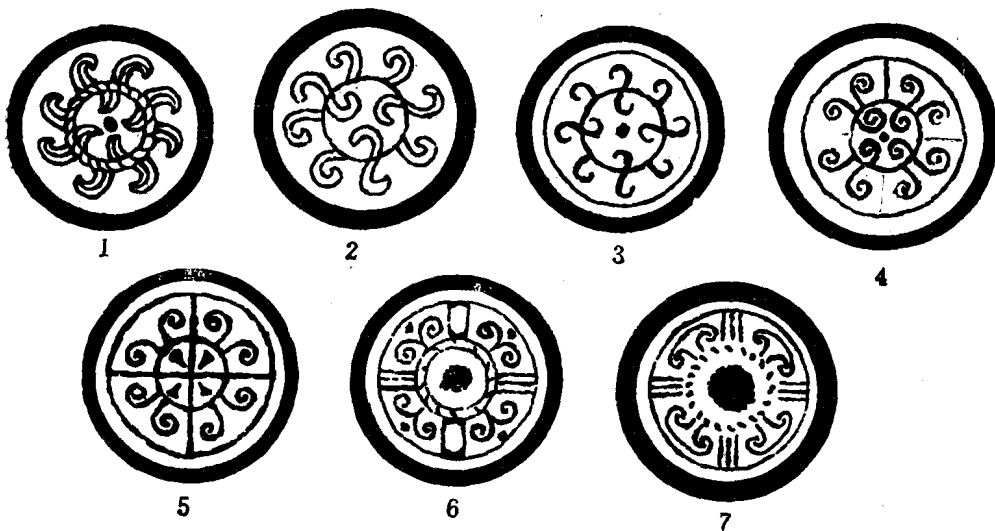


图7 葵纹向云纹的演变

1. 咸阳窑店秦宫殿遗址出土(《文物》, 1976年11期); 2. 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秦栎阳城址出土(《考古学报》, 1985年3期); 3. 凤翔河北里出土(《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4. 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秦栎阳城址出土(《考古学报》, 1985年3期); 5. 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秦栎阳城址出土(《考古学报》, 1985年3期); 6. 咸阳一号宫遗址出土(《文物》, 1976年11期); 7. 咸阳一号宫遗址出土(《文物》, 1976年11期)

形成俗称的“羊角纹”,这也就是云纹的最初形式。

同方向的葵纹瓦当,变成葵纹相间反方向排列,形成反云纹,纹饰由单线变为复线。反云纹是云纹的母题花纹(图6)。

陈直先生认为秦汉瓦当的“云纹是由铜器云雷纹及回纹演变而来。”^⑧此说欠妥,云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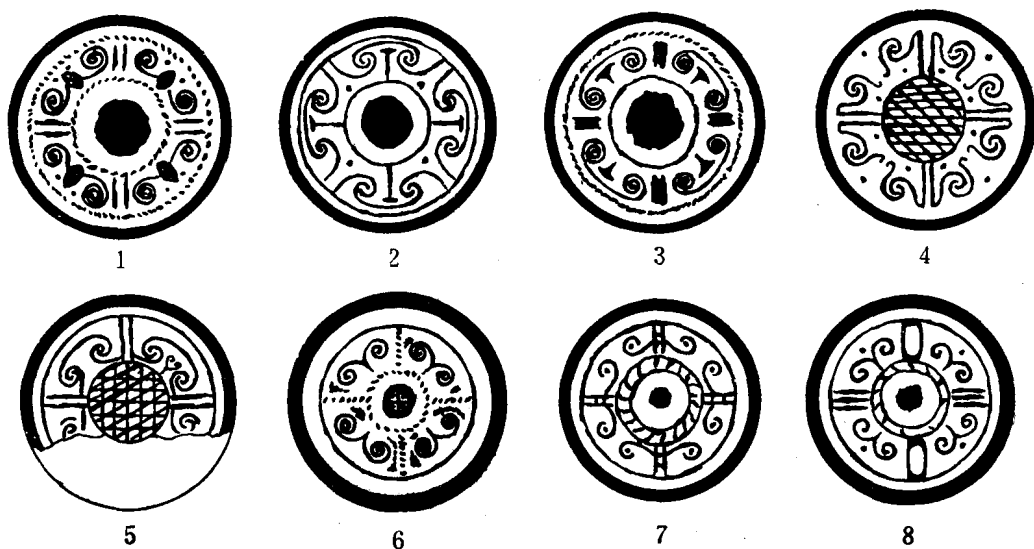


图8 变形动植物纹瓦当

1. 咸阳一号宫遗址出土(《文物》, 1976年11期); 2. 咸阳一号宫遗址出土(《考古文物》, 1982年2期);
3. 咸阳窑店秦遗址出土(《考古与文物》, 1962年2期); 4. 咸阳长陵车站秦遗址出土(《周秦汉瓦当》); 5.
咸阳刘家沟秦遗址出土(《周秦汉瓦当》); 6. 咸阳一号宫遗址出土(《周秦汉瓦当》); 7. 咸阳一号宫遗址
出土(《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8. 咸阳一号宫遗址出土(《文物》, 1976年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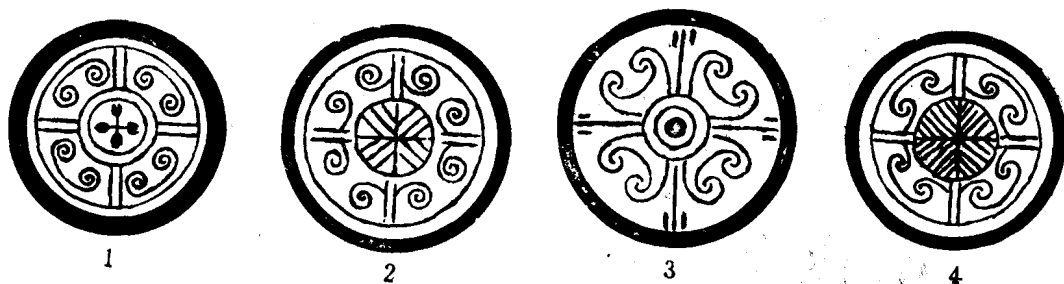


图9 云朵纹、羊角形云纹、反云纹和蘑菇形云纹瓦当(《周秦汉瓦当》)

1. 云朵纹瓦当(咸阳一号宫遗址出土); 2. 羊角形云纹瓦当(咸阳一号宫遗址出土); 3. 反云纹瓦当(咸阳长陵车站秦遗址出土); 4. 蘑菇形云纹瓦当(咸阳一号宫遗址出土)

系渊源于葵纹。葵纹向云纹的过渡发展: 一是由葵纹演变为羊角形云纹, 进而发展为蘑菇形云纹; 二是由葵纹演化为反云纹, 进而发展为云朵纹(图7)。

战国时代瓦当还有一种“S”纹, 但数量甚少。“S”纹是葵纹的基本母题花纹, 作为瓦当中的独立纹饰, 战国时代晚期建筑遗址中已出现, 个别西汉前期和中期建筑遗址中仍有少量发现。

战国时代中晚期, 伴随着从葵纹演化出来的云纹纹饰, 以云纹为母题花纹的变形动物纹出现了, 其中主要是变形动物纹, 如兽面纹、蝉纹、蝶纹等。就目前发现的这类瓦当看, 它们绝大部分出土于秦咸阳城遗址, 到了西汉时代, 这种纹饰的瓦当已很少见到(图8)。

由葵纹演化而来的云纹瓦当是关中秦汉瓦当中的大宗, 而且这类瓦当随着秦汉大一